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之立法完善路径研究

林令德 王宇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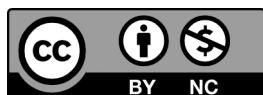
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上海

摘要 | 政策的制定与落实中离不开法律的支持与保障，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司法、执法中发挥着重要的灵魂指引作用。近年来，由于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范围内肆虐，面对社会公共法益的保护需求，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作为与公共卫生安全具有紧密联系的重要罪名之一，在此期间被重新激活并在司法实践中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了进一步解释与适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经过多年的立法完善与治理经验积累，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导下，做到了对惩治此类犯罪的“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实现了保障公众权益与个人自由的最大法律效益。

关键词 |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疫情防控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国家实践中，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主要或者基本的内容，事关国家和社会的安全、稳定与发展。”^[1]政策的制定与落实中离不开法律的支持与保障，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司法、执法中发挥着重要的灵魂指引作用。法律实现了

作者简介：林令德，上海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王宇宣，上海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司法。

文章引用：林令德，王宇宣.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之立法完善路径研究 [J]. 社会科学进展, 2023, 5 (4): 290-301.

<https://doi.org/10.35534/pss.0504028>

政策的具体化,同时法律又反作用于政策,推进政策的变革与发展。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指导我国司法机关立法、司法、执法的基本性政策。

新冠疫情流行期间,我国社会治理遇到严重挑战,在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下,面对社会公共法益的保护需求,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作为与公共卫生安全具有紧密联系的重要罪名之一,在此次疫情期间被重新激活,并在司法实践中进一步解释与适用。本文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立法历程、总体特征和适用情况着手,以新冠疫情期间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法及适用情况为样本,探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法之完善路径。

1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立法沿革与发展

从古至今,传染病作为一件具有突发性、紧急性的社会公共事件,是全球范围各个国家社会治理的共同难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传染病防治问题进行了反复的立法修正与补充,逐步建立起来一套完整防治疫期犯罪的规范体系。在新冠疫情流行的近三年里,进一步推动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立法修正,重新激活了此罪名。在此次疫情期间,发挥了重要的惩罚与预防犯罪的作用,实现了此罪名由立法孕育、成熟到完善的阶段跨越。

1.1 立法孕育阶段:行政法规的体系构建

新中国对于传染病防治的立法工作,最早可以追溯至1955年黑死病的暴发,由我国卫生部颁布《传染病管理办法》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比较全面的关于传染病防治的规定,初步以行政法规形式将传染病分为甲、乙两级,并建立起传染病报告制度。1978年我国卫生部出台《急性传染病管理条例》,进一步细化相关规范条文,对于预防和控制传染病传播发挥了较为重要的指导作用。1989年,随着上海地区甲型肝炎的暴发,我国加快了对传染病立法的步伐,新出台的《传染病防治法》将传染病的分级由甲、乙两级转变为甲、乙、丙三级,并在其规范中三十七条中规定了妨害传染病防治的刑事责任。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由违法行为转入犯罪行为的规制体系中。此时,我国旧刑法还未有“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到1997年刑法出台前,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以“违反国境卫

生检疫罪”定罪量刑。而“违反国境卫生检疫罪”其立法主要目的是针对传染病由国内或者国外传入或者传出，对于适用国内妨害传染病防治的犯罪行为并不具有针对性，此时行政法与刑法在这一犯罪行为的衔接问题上亟待调整。《传染病防治法》在总结过去立法经验的基础上，以《急性传染病管理条例》为基础，扩展到有一百八十七条的完备规范体系，行政立法对于妨害传染病行为的多次立法完善，为我国传染病防治的法律制度构建了一个较为系统、完善的框架，为之后的我国关于妨害传染病防治刑事立法与完善起到了重要的指引作用。

1.2 立法成熟阶段：罪行体系的订立与健全

1997年《刑法》中正式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引入刑法条文中，其基本罪状基本沿袭了《传染病防治法》中三十五条与三十七条的关于承担法律责任的具体规定。1997年《刑法》对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立法与《传染病防治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承继现行立法的同时，1997年《刑法》也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作出了修订与补充，比如：明确规定了单位可以成为犯罪主体；根据不同的犯罪后果，设置不同的刑罚幅度；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设定于刑法分则第六章第五节“危害公共卫生罪”之下，明确其侵害法益为公共卫生安全。然而，在2003年非典疫情发生时，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却未能再发挥应有作用。其直接原因在于1989年《传染病防治法》中甲类传染病只有鼠疫和霍乱两种，非典并不属于甲类传染病，因此当时并不能有效将妨害非典传染病防治行为与刑法分则中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相对应，少数因为违反疫情管理规定造成严重后果与危险性的行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适用处于“静止”状态，也反映出此罪名立法设定仍存在一定问题。

1.3 立法完善阶段：立法的修正与补充

对于流行传染病无法受到法律规制的问题，行政机关首先采用“乙类甲管”的变通处理方法，在非典结束后，我国卫生部在2004年、2013年修订的《传染病防治法》中明确规定，对于某些乙类传染病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违反相关规定依然承担法律责任。行政法上对于传染病的防治规定改变，

并没有在当时直接引起刑法立法的相关条文的变动。但在2019年年末,在新冠疫情席卷而来时,参考《传染病防治法》对于流行传染病的防治规定,刑法立法及时做出反应,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将“引起依法确定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传染病传播”纳入从妨害传染病防治的犯罪行为类型中,以立法方式明确了新型冠状病毒以“乙类甲管”类型进行防治的策略,在行政法与刑法上做到同频共振,这一立法修改大幅度扩大了此罪的入罪范围,不失为是立法上在“非常时间”对于新冠疫情有力回应的“有效手段”。

2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法特征与现实适用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法是为了预防与惩治传染病流行期间所出现的对社会公共利益具有特殊危险的行为。其罪立法与解释适用必然随着流行传染病的发展产生新的变化,也就要求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立法与解释具有时间上的阶段性、程度上的递进性,以及按照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导核心的立法特质。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依时依需进行立法修正,对此类违法行为发挥了有效的惩治与预防作用。

2.1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立法特征

(1) 在时间上展现阶段性特征

截至2023年年初,三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步入尾声,在我国五部门联合出台《关于适应新阶段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依法妥善办理相关刑事案件的通知》之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法律适用必然会随之再次冷却。回顾该罪的立法历程与其司法适用的实际状况,其罪名变迁的进程中是一次次突如其来的疫情给公民生活带来的冲击下立法经验的累积,是在国家大政方针与刑事政策指导下的自我革新与发展。回顾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立法之路,是在不同程度、不同疫情特征、不同犯罪现实下,响应修正与发展的变革之道。这既体现了“从严”打击疫期犯罪的总体政策,也在区分此罪与彼罪、罪轻与罪重、犯罪发生的情节轻重等环节坚持贯彻“从宽”的整体要求。但是因为突发性传染病其本身具有未知性、特殊性、流行性,使得此罪名相应的稳定性减弱,而呈现出在一定阶段具有稳

定性,使得在特殊时期、特殊阶段,能够有针对性地打击犯罪,发挥刑法积极预防的作用。

(2) 在程度上呈现递进性特征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刑法立法离不开关于传染病防治法的行政法立法先行。如何在行政法规制范围内认定其是否违法、违法程度、是否承担违法责任,如何在行政法与刑法衔接之处,区分其是否构成犯罪、认定犯罪情节轻重,如何在刑法规制范围之内,厘清此罪与彼罪、罪名之间的竞合关系,以及量刑轻重的问题,此类行为由于行为社会危害性与情节恶劣程度不同,其反映在立法上呈现出递进式的、链条型的全方位不同程度的规制路径。随着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立法完善,在之后类似传染病再次流行之时,会呈现出更具有稳定性、有效性的刑法反应。

(3) 在立法精神上反映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实践鲜明地证实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我国立法、司法、执法领域重要的指导性作用,揭示了当前犯罪圈不断扩张带来的公民权利自由与公共利益保障的紧张关系。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立法与适用历程里,我们可以看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深刻影响,如何“从严”、如何“从宽”、如何达到“宽严相济”,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立法与实践中,展现出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对于不同的时间、空间、条件、领域,刑事政策的重心是宽是严,会有不同的选择。”^[13]如何发挥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我国刑法发展道路上的指引作用,使得刑法之“苛”不殃及无罪无辜之人,使得刑法之“宽”关切到每一个犯罪者,使得在特殊情况下、紧要关头,刑法能够最大地发挥其惩罚预防犯罪的效用,是刑事政策与法律相互交融、相互贯通的终极目标。虽然此次疫情业已步入尾声,但是我国的法治之路任重而道远,如何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更好地打造良法善治的法治环境,仍是需要不断实践、积累、探索与实现自我革新发展长久课题。

2.2 近年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立法适用

基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立法特征,其具体适用过程也呈现了明显的阶段

性特点,也即在传染病流行期间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暴发”,自2003年非典以来,我国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立法适用进入了一个长期的沉默阶段,直到新冠病毒流行又重新活跃,从我国近三年的对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裁判文书数量来看,我国对此犯罪行为的立案数量达到历史之最。

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统计,2020年1月1日至2023年1月1日也即新冠疫情流行期间,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为案由的裁判文书数量共计97篇,其中,刑事一审案件83篇,二审案件9篇,2020年共计相关裁判文书75篇,2021年共计相关裁判文书14篇,2022年共计相关裁判文书8篇,受理法院主要集中于河南、湖北、广东等新冠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根据《刑法修正案(十一)》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相关立法修订与解释,新冠病毒属于“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乙类传染病,在97篇司法判决文书中,大部分都是由于行为人实施了违反相关疫情防控措施的行为,也即刑法三百三十条规定中“拒绝执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的行为,具体而言,包括隐报行程、拒绝遵守隔离要求、不按规定完成核酸检测等行为。如果这些行为造成了传染病传播的危险或者已经具有严重危害结果,就涉嫌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但造成危险后果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在检索的司法裁判文书中,本罪虽然有两个量刑阶梯,但是此罪的量刑大多是三年以下,判处6~8个月有期徒刑的居多,判处无罪的案例较少。通过对于司法裁判文书的分析可以看出,司法机关在近三年对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关注度较高,尤其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流行的第一年,对于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采取了依法从严治理的政策态度,也在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下对该犯罪适用了严厉的自由刑,对于依法应当定罪处罚的案件做到“应判尽判”,在疫情发展期间也起到较为显著震慑犯罪、预防犯罪的作用,该罪的犯罪率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达到了从严治理的刑事政策目的。

3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法完善

如何化解人权自由与公共卫生安全的保障之间的矛盾冲突是中国法治建设

长久以来的重要课题。要依法及时地惩治妨害新冠疫情防控的违法犯罪活动，刑法规制必须发挥其实际作用，打造良法善治的司法环境，全面践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既要对其妨害疫情防控行为进行严惩，从而发挥社会警示作用，又要对于犯罪情节较轻、危害性不大的犯罪行为予以从宽处理，把握好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的界限。在处理有关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有关立法及适用问题上，要充分发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指导作用。

3.1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的立法从“严”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创新发展的重点在轻罪领域”^[2]。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自设立以来，其最初目的即是在传染病流行这一特殊时期，维稳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公共安全，而针对此时妨害传染病防治的行为拟制的法律规定。如果没有传染病的侵袭，不会出现传染病相关犯罪立法，此条法律不会如此为大众所知悉与重视。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初期，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颁布的《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确立了对疫期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管理办法而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依法从严”的具体刑事政策。^[3]2020年12月26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进行重要修改，重新激活了此一长期处于沉默阶段的法条，是我国司法机关对于疫期违法犯罪以“从严”立法的刑事政策态度的体现。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修订出台之前，关于疫情期间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要么由于情节轻微、未造成实质危害结果不构成犯罪，要么根据其造成的实际危害结果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罪行结构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在一定情况下会出现竞合的现象。但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其入罪范围远远窄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规定，而且社会危害性更高、刑罚严厉性更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以对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危害结果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仅要求对公共安全法益造成严重危险或后果作为构成要件。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属于“轻罪入刑”，是积极刑法观回应社会治理需要，犯罪圈扩大的结果。可以说，设立本罪的初衷本就蕴含着

对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这一相比较而言较轻的行为从“严”惩治的目的。

关于本罪的责任形式,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与呼声,刑法理论上一般认为是过失。^[4]但也有学者认为将本罪确定为过失犯罪,缺乏“法律有规定”的前提,故认为本罪属于故意犯罪。^[5]也有学者将其主观责任要件解释为危险故意加实害过失^[6]。过失说作为通说,认为行为人对其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的危害结果或者造成的严重危险,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或者是已经预见但是轻信可以避免,实质上比故意说犯罪处罚范围更宽泛。而近年来故意说的主张,实质上强调了行为人对其危害行为以及危害结果的明知与确信,“从法条内容本身理解,将该罪认定为故意犯罪,更能够限缩刑罚范围”^[7]。笔者认为,故意说与过失说的争议,在一定层面上来说对于本条法律规范应“从严”把握还是“从宽”把握的问题。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举国上下进入共同抗击流行传染疾病的关键时刻,从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的法益来讲,行为如果造成严重危险或危害结果,破坏了国家对传染病防治的秩序,甚至造成了传染病的传播与扩散,危害了公共安全,行为人即具有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在犯罪行为人对自身行为具有明确认识并且对于当前疫情防控处于紧张局势具有基本认知的情况下,仍然实施妨害传染病防治的犯罪行为,其主观上应包括对自己的行为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对于此类犯罪行为应贯彻落实“从严”治理的刑事政策,以过失说解释此条刑法规范更符合“从严”治理的刑事立法目的。

3.2 “当宽则宽”调和立法的积极性与谦抑性

从严治理,但不是一律从严,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法律适用中,要贯彻“当宽则宽”的刑事政策精神,既要发挥积极刑法观在犯罪预防的积极作用,也要贯彻落实刑法谦抑性,防止刑法过度“工具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是要求一味地“从严”或者一味地“从宽”处理,在社会发展不断变化、新形势新情况不断出现,尤其是犯罪情况发生改变的现实条件下,要客观、及时地把握不同时期维护社会安全、保障人权、惩治犯罪与违反犯罪的实际需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要及时调整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影响下依法“从宽”“从严”处理的对象、范围和力度。对于根据现实情况,犯罪性质、情节显著轻微和社

会危害性较小的行为,从宽处罚更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减轻处罚力度。

2023年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海关总署联合出台的《关于适应新阶段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依法妥善办理相关刑事案件的通知》,其中规定,对违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预防、控制措施和国境卫生检疫规定的行为,不再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定罪处罚。^[10] 这是在后疫情时代我国刑事司法对于涉疫犯罪管制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一个节点,是对于恢复社会安全秩序、适应新的防疫手势、响应国家政策导向、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及时反应。也强调了在新的疫情防控手势下,对于不同类型违法犯罪行为如何全面准确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调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积极立法的积极性与刑法的谦抑性关系。对于“对侵犯医务人员人身安全、扰乱正常医疗秩序和严重妨害养老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等重点机构防控秩序,对涉疫药品、检测试剂等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哄抬物价等危害严重、性质恶劣等犯罪行为”要依法“从严”惩治,对于“对涉疫轻微刑事案件”重在疏导和化解矛盾,要依法“从宽”惩治。这意味着,违反新冠疫情预防管理办法不再是犯罪行为,这一轮的疫情阻击战进入了“层层减码”的恢复阶段,“从严”惩处的违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管理办法的违法行为逐渐向“从宽”处理过渡。尤其是在确定对待新冠病毒采取“乙类乙管”类防治措施后,整体的防控手势转为“从宽”处理。

3.3 发挥好宽严相济之“济”的双向作用力

宽严相济之“济”强调“宽”与“严”的协调与平衡,从而使宽严形成良性互动关系。^[11]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立法与适用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下的新冠疫情期间达到了更为有效、公平的犯罪治理效果。在制度适用上,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经历了“严”至“宽”的发展过程,新流行毒株的势头大幅度减弱,在这一整阶段疫情期间,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妨害传染病犯罪立法与解释、适用过程中,不但发挥了整体“从严”的治理角色,也实现了“以宽济严”的贯彻落实。从严打击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能够发挥好刑法惩罚犯罪、预防犯罪

的积极作用,对于违反疫情管理措施造成严重危险或危害后果的犯罪者以严厉的处遇措施,而从宽处理是在于危险性小的违法犯罪者以轻缓的刑罚处置。在疫情初期阶段、中期阶段、后期阶段,根据实际疫情防控需要与犯罪的恶劣程度,予以罪轻、罪重的区分,根据犯罪者罪行轻重、认罪态度、自首立功表现等,予以量刑幅度上的区分,更能够使得“宽”与“严”之间的关系相平衡,使得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的刑法规范、司法程序、刑事执法等相关制度之间更为协调,形成更为流畅的互动关系。在法益保护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使得维护公共卫生安全与人权自由保障的法律目的得到了最大限度地体现。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立法本身是刑法介入时间提前、犯罪圈不断扩张的过程,是当前“轻罪入刑”立法趋势的体现,如果不加以调整,一味地扩大犯罪圈,必然会导致我国人权保障的失衡。有学者已经提出,“重刑轻民的中国法律传统在当今社会以对刑法的过度迷信与依赖、以不断设立新罪的方式变相地表现出来”^[12]。如果说,在面对传染病大流行的特殊时期,刑法为了更好地发挥惩罚犯罪与预防犯罪的作用而进行适当的调整与扩大是必要的,那么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这一“润滑剂”对于“从宽”与“从严”的分化与协调下,能够更好地发挥现有法律规范的应有作用,维护法益保护与人权保护的平衡关系,以致公民不至于承担过重的刑事处罚。

参考文献

- [1] 胡象明. 中国传统政策文化及其对政策科学本土化的价值[J]. 中国行政管理, 2017(2).
- [2] 万春.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创新发展的检察实践[J].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22(4).
- [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EB/OL]. (2020-02-10)[2023-01-10]. <http://www.scio.gov.cn/xwfbh/xwfbh/wqfbh/42311/42602/xgzc42608/Document/1674053/1674053.htm>.
- [4] 高铭喧, 马克昌. 刑法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 [5] 张明楷. 刑法学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21.
- [6] 张钢. 论危险故意的构造: 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为例 [J]. 政治与法律, 2022 (9).
- [7] 陈兴良. 过失犯的危险犯: 以中德立法比较为视角 [J]. 政治与法律, 2014 (5).
- [8] 曹化.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惩治妨害疫情防控犯罪 [N]. 上海法治报, 2020-05-13 (5).
- [9] 最高人民检察院200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EB/OL]. (2006-03-11) [2023-01-10]. https://www.spp.gov.cn/spp/gzbg/201208/t20120820_2493.shtml.
- [10]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海关总署关于适应新阶段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依法妥善办理相关刑事案件的通知 [EB/OL]. (2023-01-17) [2023-01-28]. https://www.spp.gov.cn/spp/xwfbh/wsfbh/202301/t20230107_597849.shtml.
- [11] 王光明, 武景磊.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恐怖犯罪立法中的贯彻及完善 [J]. 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1).
- [12] 刘艳红. 我国应该停止犯罪化的刑事立法 [J]. 法学, 2011 (11).
- [13] 夏勇.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具体体现 [J]. 人民检察, 2020 (8).

Legisl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Crime of Hindering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Policy of Tempering Leniency and Strictness

Lin Lingde Wang Yuxuan

*School of Criminal Justic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Abstract: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support and guarantee of laws. Criminal polic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riminal legislation, judicature and law enforcement.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global ravages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the crime of interfering with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charges closely related to public health security, has been reactivated during this period and further interpreted and applied in judicial practice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After years of legislative improvement and management experience accumulation, an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riminal policy of combining leniency with severity, the crime of hindering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has been punished with “leniency when necessary, striceness when necessary, and leniency with severity”, realizing the maximum legal benefit of protecting public rights and individual freedom.

Key words: Temper justice with mercy; Criminal policy; Crime of hindering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